

# 论清刻古籍善本

朱泽吉

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适应四化建设需要而研究和整理善本古籍，不仅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包含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以往谈善本，惟宋元旧槧、明人精刻，以及各个时代具有学术价值的原稿本、旧抄本和名家批校本为世所重。至于清代雕印的书籍，由于时代切近，流传尚多，向难跻身于善本的行列。这种观念，是在清代开始形成的。晚清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辑条例中，把他所收罗的善本区为四类：一曰旧刻，二曰精本，三曰旧抄，四曰旧校。他所说的“旧刻”，专指宋元遗帙；“精本”则仅限于明人佳槧，特别是嘉靖以前的版刻。这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所标四类也正体现了清人对善本范围的理解。其后虽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清代的精刊和稀见刻本，但对它们迄未做全面分析，没有集中探讨过清刻古籍在版本学上的地位。普遍说来，人们对善本书的观念，并未完全脱出清人的窠臼。因此，今天提出研究和确定清刻善本，实际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

古籍能否列为善本，原从比较而来。善本书的含义和范围，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传世久远，本来只是构成善本的一个条件，如果囿于成说，惟古为重，甚至把“清刻”和“善本”当成两个

互不相容的概念，显然是不恰当的。明末藏书家祁承燾说：“书籍与代俱增，而亦与代俱亡之物也。”（《澹生堂藏书约·鉴书》）我们不仅应当看到近三百年来图籍的日益浩繁，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旧刻新雕的日益阙佚。就清刻古籍来说，以往难得的，今固尤甚；而前之易得者，现在也往往难于觅求。至于以刊印精良而著称的版本则更趋稀见。叶德辉诗云：“当时视寻常，后世殊珍异。”（《书林清话》九）这是符合古书流传的客观规律的。

我们应当改变历来那些收藏家、鉴赏家们一贯轻视和忽视清代刻本的狭隘观点。不能等这些古籍日就湮没之后再来摩挲品题，叹赏它们的“稀如星凤”。当然，从整体情况来看，现存清刻古籍的数量仍旧是惊人的，而且触手可得的又都是一些习闻惯见的刊本。从这样浩如烟海的图籍中确定善本，必须在防止庸滥的前提下精心抉择，取所当取，才能归于至当。正因如此，要真正做到宽严得体、去取合宜，是比较难掌握的，也是容易有分歧意见的。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 一、鉴定清刻善本的标准

鉴定善本必须有谨严的态度，要从多方面审慎地考虑问题。但是，研究不同时代刊印的古籍，着眼点也有所不同，所持的标准和所需的知识是有很大差别的。

能够保存下来的宋元旧槧，大抵是四部要籍。即使有的书学术价值并不高，但由于它们时代已远，镌印精工，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既能幸传至今，也应当看做艺林至宝。因此，我们考察宋元刻本，主要任务是通过分析比较来确定版刻年代与印刷先后，要能根据它们的版式、行款、字体、纸墨、刻工、牌记、序跋、题识，以及书中避讳和藏家印章来鉴别真贋，区分原刻与后人翻刻、仿刻的

不同。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有专门的版本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即使具有这样的知识和经验，也很难说必然可以做出绝对准确的判断。

就清刻古籍来说，固然也需要分清某些原刻与复刻、初印与后印之间的差异，可是此外则很少有判别时限、区分真伪的问题。从浩瀚的清代刊本特别是清人著述中确定善本，主要须根据书籍的性质、内容、学术价值、版本源流以及传世多寡来辨识。有些镂印甚精的名著，如果传布尚广，并不一定纳入善本的范围；相反，另外一些有用而罕见的撰述，即使在雕印艺术上远非上乘，却更值得珍视。总之，在学术方面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而又传世极罕，当是清刻善本的基本条件和首要标准。

如果我们说，鉴定清刻善本似易而实难，难就难在首先需要熟悉大量古籍的实际内容而不仅是雕印形式，要能充分了解它们的科学价值，掌握它们的传布情况，从而做出比较恰当的判别。

确定清刻善本，多数意见认为应当有一个时间断限，主张断自乾隆以前。这体现了重视清初原刊旧刻的精神，原则上没有不当。但是，如果过分拘守这样的标准，机械地排除清中叶以后的版刻，也会造成弃所当取，使某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稀见精刊被推出善本的大门。因为在清刻古籍中实际还存在着下列一些特定情况：

譬如，前代有些著述，到清朝后期始精校付梓，而不久又由于某种意外原因成为十分罕见的版本，这就很值得宝贵。象宋卢宪所撰的《嘉定镇江志》三十卷，是著名的古地志之一。但原书久佚，乾隆中始由《永乐大典》录出二十三卷，以钞本形式流传。在阮元支持下出现的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校刊本，实际是本书的第一个刻本。这个刻本的校勘工作出于刘文淇父子之手，比较完善（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十二）。可是因为它“传布无多，经咸丰之后，墨印益少，版片久失”（陈庆年《嘉定镇江志重刊本跋》），所以六十年

后才又出现了丹徒陈氏重刊本。可见道光原刻虽然距今甚近，但却以其精审和罕传而弥足珍贵。这类情况在清代刻本中是常有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清初或乾嘉时代一些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能迟至清末始得梓行，倘或版片亡失，又未重刻，传本自然日稀。如清人为《三国志》作补注工作的有十数家，其中唯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最称详赡。这部书直到光绪时始刊于广雅书局，而历时未久，版即遭毁。后来汇集《广雅丛书》、《史学丛书》时亦未得收入，目前行世者唯抗战前影印本而已。这样，赵著尽管是光绪刊本，但现在已成为难见的旧籍。

再有，清中期以前的撰述，自当以原刊初印为贵。但晚出的新刻本如果搜罗更加完备，校勘更加精审，而又流传较少，其价值往往可以更高于原刻。如《纳兰词》以康熙三十年《通志堂集》本为最早，后来始有单行别本。至道光十二年汪元治刻本出，于各本字句异同，汇校并存，其详备乃凌驾于一切旧刻之上。这部词集后来曾收入《榆园丛刻》及《粤雅堂丛书》，得到推广，但汪刻原本却殊不易得。同样情况，宣统时董康精刊的《梅村家藏稿》，在内容和雕印方面都远胜于康熙原刻本《梅村集》，学者并未以其晚出而忽视。

另外，许多有用而罕传的书籍，本身就是清代后期的撰述，当然不可能有更早的刊本。因而也就不能以乾隆为限定去取。如许瀚是嘉道期间卓有成就的训诂学家和校勘学家，他的《攀古小庐杂著》到光绪时才得锓版，可是久已成为许多学者难获一见的作品。又如道光时邓传安所著《蠡测汇钞》，为研究台湾风土提供了有益的史料，其书虽为道光十年所刻，但因传本甚少而颇难觅求。这类事实，不可缕数。总之都说明，对清代后期刻本一概采取摈弃的态度，是不利于发掘和保存善本的。

## 二、清人著述的罕见刻本

在清刻古籍中，绝大多数是清人自己的著作。其中有许多罕见版刻是值得宝重的。大略言之，可分数类：

一是学术专著。清人撰述繁富，有裨学林，但有很多要籍佳槧，已极为罕觐。举例而言，属于金石图象方面的如阮元摹刻并考释的宋王厚之《钟鼎款识》、刘喜海所辑的《金石苑》等，地理方面如白潢、查慎行纂修的《西江志》等，书画艺术方面如卞永誉集录的《式古堂书画汇考》等，科技研究方面如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等，镌印既精，又鲜流传，在清刻中甚为名贵。至于某些卷帙很少而富有资料价值的专著，如果丛书未收，仅仅是单种零刻，往往极难保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版刻平常，也同样值得珍护。

清代有很多学术著作，目前仅有重刊本行世，原刻已甚不易得。如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看来是极普通的书，但目前见到的最早刻本却只是道光十六年黔西史氏重刊本和道光十八年扬州刘氏重刊本。其后自姚氏咫进斋以下，又有多种刻本出现，皆源出于刘本。实际上，福建原刊本较后来传刻诸本在文字上颇有异同，足资参证，而现在殊为罕见。又吴玉搢《别雅》，不又康熙原刻已少，即乾隆七年程氏督经堂刊本也因版片被洪水漂没而传布甚稀。因此，根据不同情况，对清代某些学术专著的初刻本以及早出的重刻本加以珍视，是完全必要的。

二是文集。清代文集不可胜数，有的名似杂著，实亦文编。这些别集的性质是很复杂的，在今天的价值、作用也很不一致。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一些稀见的考证家的文集，因为它们保存了大量诂经、证史、考文、审音的论著。这些书虽然很负盛名，为学者所熟知，但一一搜求起来，却又并非易事。甚至乾嘉时代一部分大家的

文集如《西庄始存稿》、《袖堂文存》、《果堂集》、《东潜文稿》、《幼学堂集》、《研六室文钞》、《简庄缀文》等等，不下数十种，由于初印既少，多未重刊，也都逐渐成为十分难得的著述。

至于未经抽毁或虽遭禁毁而幸存的清初别集，如冠有钱谦益序文的二十卷本《梅村集》、康熙时刻印的《虬峰文集》、雍正初刊行的《吕晚村先生文集》等，在学术上亦各有其特殊意义。此外，还有很多稀见的诗文集，在文学上虽不占地位，又未收什么学术论著，但它们当中的许多碑传、书札、序跋、题记以至唱和赠答的诗篇，却常为研究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提供了可贵的线索或依据。因此，从史料价值出发，对一些刻本甚少的冷僻别集，也应加以重视。多年以来，有些学者或藏书家曾用很大精力专务罗致清集，主要是为了以上的种种原因。

第三，在清代的笔记稗说中也不乏值得珍重的版刻。清人笔记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种属于读书札记，以考订为主，大都能列入著作之林，因而传本甚多。另一种则属于野史稗乘，以记载掌故史实为主，当时人不过借以增广见闻，甚或聊资谈助，并未给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类笔记往往保存了多方面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有关某些政治事件的记载，更足以补史籍的缺失。不过它们也常因此而触犯禁忌，以致影响传播，造成湮没。我们所珍视的清人笔记，正是以这类稗乘的稀见刻本为主。象董含的《三冈识略》，仅有康熙初光复堂刊本；刘靖的《片刻余闲集》，仅有乾隆十九年刊本；法式善的《陶庐杂录》，仅有嘉庆二十二年大兴陈氏刊本，等等。这些书颇具文献价值，可是一向少见。《陶庐杂录》在法式善所著的笔记中是最难得的一种，近年虽已有了校点排印本，而原刊仍自可贵。还有些传本甚少的笔记，不但在内容上足供采摭，而且在刻印方面也很考究。例如释大汕的《海外纪事》，有康熙三十五年刻本；袁栋的《书隐丛说》，有乾隆初刻本，都是雕印工雅，富有特色的

版刻。在研究清代版本时，不当以稗说野史而忽之。

第四，稀见的方志刻本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清代是方志产量最多的时代。据《中国地方志综录》所收，清人所修的志书，占宋以来方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说明古方志亡佚者甚多，同时也足以看出清代志书的繁富。从纂修情况看，清代方志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著名学者独撰、主修或参与商订而编成的。它们向以体例谨严、整飭有法为世所重，但目前有的已很难寻觅，初印尤不易得。这些出于专家学者之手的名志，亟待我们认真访求和保护。另一类是以各级地方官吏名义主修的志书。他们开局修志，不过是为了奉行政令、博取声誉、位置冗员，纂修时大抵皆钞撮档案、堆砌材料，内容极为芜杂。但正因如此，它们也往往汇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成为供批判使用的丰富的史料宝藏。这些官修志书，一般印数较少，过去又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已十分罕见。特别是一些纂修时代较早而又比较偏远的府州县志，更为难得。从大批方志中斟酌选汰，确定善本，是一项非常重要和艰巨的工作。

第五，考察清人撰著中的善本还须注意到小说、戏曲及其它通俗文学作品。清代小说、戏曲虽称繁荣，而一些名著的原刊旧刻却多已失传。如《儒林外史》初为乾隆刻本，但始终未见；传世者惟嘉庆时卧闲草堂刊本及艺古堂复印本最早，也都成为稀见的珍品。《桃花扇》、《长生殿》虽各有康熙原刻，而藏者甚罕。象李渔《十二楼》这样较为次要的作品，不仅原刊久佚，精闲居附图精刻本已成孤本秘笈，即使嘉庆时会成堂重刊本以至坊刻巾箱本，亦皆难遇。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凡例》中有云：“小说之书，明清旧本原刻，因夙昔之鄙弃而日少，与四部宋元旧本因代远而日少者，其原因虽不同，而至于今日其因稀而见珍于世也则同。”事实上，一切通俗文学刊本的传布情况，莫不如此。这多年来，经过收藏家和研

究者的搜求,许多小说、戏曲、弹词以及民歌俗曲的旧本原刻,盖已罗致殆尽。可是尽管如此,清代二百数十年中坊肆间所刊的通俗作品,散在全国,其堪称善本,见于著录或未经著录者,均尚有之。这些还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识辨。近人所撰小说、戏曲书目,或附考版本,或兼注藏家,都可以供鉴定鉴别工作中参考。

### 三、前代著作的初刻本和首次重刻本

清刻古籍中有不少是前人著作的首刻本或第一次重刊本,其精审稀见者,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归属于清代善本的范围。

明人及其以前的撰述,有一些是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到清代才首次付刊的。如白朴《天籁集》,元明两代,向未梓行。清初杨希洛始据抄本厘为二卷,并掇拾他书所收小令、套数附于编末,于康熙四十九年由环溪王皓写版付刻。又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旧有明初陶宗仪写本,至乾隆十四年,方由松江张氏松桂读书堂刻版以传。明代沈啓所撰《南船记》,记载翔实,图文并茂,为了解古代船舶制造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书成于嘉靖时代,但到乾隆六年始有刊本。象这类前代著作的首刻本,镂印既精,日稀日贵,所以深为讲求版刻者所珍重。

晚明撰著在清初始行付梓,更是很自然和较普遍的情况。例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是继张华《博物志》、释赞宁《物类相感志》等书之后进一步推阐物性的一部科学著作,对研究古代科技史很有参考价值。作者的名著《通雅》,已于崇祯时刊行;而此书则以康熙三年于藻刻本为最早。不过目前传世者主要是光绪十年重刊本,于氏首刻已甚为罕见。另外有些归属晚明的著述,实则写于清初,如张岱的《西湖梦寻》,就是他在明亡后追忆西湖繁华、寄托感慨而作。其书有康熙五十六年原刊本,刻印甚工,传世亦少,一向

被目为珍贵的版本。

晚明史籍和诗文别集，很多是在清初始刊而后再遭到清廷禁毁或抽毁的，《清代禁书知见录》记载甚详。这些书有的到后来还照常传刻，有的则由于禁毁而罕见或散亡。凡幸存的晚明史乘，近百年中根据历史形势发展的需要，都曾单付排印，或则汇为丛刊，其所据底本，多为清初所刻。至于一些经过禁毁的晚明别集，如方以智《浮山文集》（清初刻本）、邝露《峤雅》（顺治间精刊本）、董说《宝云诗集》（康熙二十八年刻本）等等，有的传世至罕，有的则已成孤本，濒于湮灭，因而均有认真护惜的必要。

有很多古籍，在宋元时虽曾付雕，惟以年代久远，版毁书绝，或者偶存孤本，但无可寻踪。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首次重刻本就成为目前传世最早的刻本，具有和原刊同等重要的意义。

譬如北宋时朱长文《乐圃余稿》，据四库著录，其全集本为百卷，刻成后版毁于兵，南宋时其从孙朱思辑得部分佚作，编为《余稿》十卷付梓。但现在南宋刊本又不可见，传世者惟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寿重刻最早，而且亦甚不易得。此外如康熙三十七年震泽徐惇复校刊的《苏学士文集》，康熙五十五年石键据渔洋书库藏本重刻的《徂徕石先生全集》，康熙六十年锡山王邦采复宋刊《徐节孝集》等，都是各书现存最早最佳的刊本。象苏集已为《四部丛刊》采为底本；徐集镌印亦甚精工，论者以为“虽非宋刻，亦可谓下真一等”（罗振堂《善本书所见录》四）。在宋刻久已失传的条件下，对清代这类稀见重刊本的价值是不应忽略的。

还有些古籍，据前人著录或尚有旧刻传世，但目前存佚未卜，也当以清代首次重刊本为贵。特别是校印精良而比较稀见的版刻，更应引起重视。如陆龟蒙《笠泽丛书》，据清人所见，尚有宋蜀刻本、宋樊开本、元陆德原本、明李如禎本等多种旧刻存在，但因踪迹无闻，存亡难定。当前行世者实以雍正九年江都陆钟辉碧筠草堂

仿宋本为最早，其书原出于元代至元六年刊本，后来比较多见的姚氏大叠山房本，东山草堂本，都是据碧筠本复刊的。又有于封面题“水云渔屋刊本”者，实即陆本。此后又有乾隆间顾健复元刊本、嘉庆二十四年许榑古均阁校刊本。许刻以宋樊开七卷本为底本，另外又参考了元明以来多种刊本和钞校本，竭十余年功力勘定，然后手写付梓。由于印数甚少，所以丰城熊氏、海昌陈氏皆曾影印。总之，在今天所能见到的《笠泽丛书》中，陆、许两刻最称精审，无疑应归于清代善本之列。

明人著作有很多是经清代重新校刊的，大都胜于明本原刻。因此，无论有无明刊传世，一些稀见的清人重刻本往往更为可贵。如归有光《震川文集》，现存的万历原刻即远逊于康熙间归庄家刻本。又弘治间都穆所辑的《金薤琳琅》，原刊本未见，目前行世者惟乾隆四十三年杭州汪氏重刻大字本最早。其书校印并精，于原刊疏失多所订正，故学者咸推为善本。光绪间葛氏学古斋汇刻《金石丛书》，即以汪本为据。近人潘景郑谓曾见《金薤琳琅》原刻本，出于独山莫氏，后亦杳无下落（《著砚楼书跋》一六九）。其实原刊无论存佚，乾隆首次重刻本也是本书赖以传布的最完善的版刻，因而有更值得珍视的一面。

#### 四、代表清代雕印艺术的精刊本

清刻善本应以学术价值较高而罕传稀见为基本条件，这不等于说，清代的雕印艺术无足取，更不是说清代没有刻印精工、为版本家推重叹赏的佳槧。前文的论述中，事实上已经涉及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清人精刻。下面专就足以反映清代雕印艺术水平的刊本，略加论述：

清代殿本及内府所刊诸书，在形式上是十分考究的。这类刻

本,书品宽大,装帧堂皇,加以镌刻工致,墨色纯良,又多用开化纸或榜纸精印,其名贵无须赘言。康熙四五十年间,曹寅主持扬州诗局时为内府刊印的各种书籍,以及他本人辑刻的丛书,均经手写钤版,字体端秀,纸墨莹洁,颇有宋槧遗韵。人们常把这些书做为康熙刻本的代表,称之为“康版”,足见宝贵。

从私家刻书来说,清初秦馥摹宋刊巾箱本《九经》,以及稍晚一些张士俊摹宋刻《泽存堂五种》,都是极负盛誉的精刻。此后由于考证学的逐步发达,许多学者在重新校理刊行大量古籍的同时,也竟以影刻或仿刻宋元善本为尚。以经史而论,著名的如黄丕烈影宋严州本《仪礼郑注》和影宋刊《国语》、《国策》,张敦仁影宋淳熙抚州公库本《礼记郑注》,汪士钟影宋景德本《仪礼单疏》和元泰定本《孝经疏》,臧庸仿元雪窗书院本《尔雅注疏》,以及胡克家复元刊本《资治通鉴》等,均为书林所称道。在清代官刻的古籍中,复宋元版本的经史要籍很少,而且也没有完全忠实于原刻的精神面貌。有的版本学家曾认为这是清代刻书的一种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一些私家精刻就更能显示出它们的重要代表意义。

清代的复宋或仿宋刻本,还包括了其它各类古籍。象吴鼐影刻宋乾道本《韩非子》,胡克家复宋淳熙本《文选注》,聊城杨氏仿宋本《蔡中郎集》,缪日芭仿宋本《李太白集》,项綢翻宋本《韦苏州集》以及前文所举的陆氏碧筠草堂复元刊《笠泽丛书》等,也都是清代著名的版刻。缪、陆诸刻特别是胡刻《文选》,均经后人多次复刊或影印,吴刻《韩非子》且经日本仿刊,足见原本的精审。

清代有很多专门辑刊宋元明善本的丛书,被称为清代丛书中的“版本派”。开辟这一风气的是黄丕烈。他曾在鉴藏的基础上,斟选自己所得的宋元佳槧,由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为之勘定后次第刊行,于嘉庆二十三年汇成《士礼居丛书》。这部丛书经过兵火之后,流传日稀,初印尤为名贵。同时秦恩复石研室所刻的多种古

籍，虽无从书之名，实际也属于黄氏一派。他刊行的书，从文字校勘到雕印形式都非常考究，当时号为“秦版”。其后如聊城杨氏、常熟瞿氏影刻的古籍，直到清末黎庶昌访求日本所藏中国古书善本而影刊的《古逸丛书》，都是“版本派”的著名代表。黎书刻成之后，曾印刷百部，“以赠当时显者，皆叹为精绝”（杨守敬《邻苏老人自订年谱》）。这部丛书的版片后归江苏官书局，摹印已远不如前，惟在东京初印的美浓纸本，收藏者认为是足以与宋槧元刊争光比烈的。

在清刻古籍中，受到重视的主要是一些精美的软体写刻本。清初刻版，一般都用长形仿宋字体，风格与明末刊本甚为相似。后来逐渐发展为方形硬体，粗拙板滞，以致毫无艺术性可言。但是，也有许多精校、精刊本一直保持了宋人刻书的优良传统，请擅长书法的人手写上版，并由名工精心雕印。上面所说曹寅在扬州诗局刊行的书，就都是软体写刻。此外还有很多著名写刻本，这里无须臛举。前人所谓“康雍缮写工，乾嘉校勘细”（《书林清话》九），就包含了对清代写刻本的赞美。不过用软体缮写的佳刻，实际上并不限于康雍时代而已。

清代有很多以善于写版著称的专家。如林佶、黄仪、余集、许翰屏等，均为研究古籍版刻者所熟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常为他人写版的名手，本身大抵是“清贵”的官吏、知名的学者，并不以佣书为业。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对写版的高度重视。象林佶就是东南有名的藏书家，康熙进士，曾官内阁中书，著有《朴学斋集》等。出于他手写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古夫于亭稿》、《钝翁文钞》和《午亭文编》，论版刻者称之为“林佶四写”，极负盛名。黄仪则是很精博的舆地学家，尝与阎若璩、顾祖禹等同修《清一统志》。王士禛《渔洋续集》付梓时，拟仿宋槧，曾专门请他写版，《香祖笔记》卷二记其事甚详。为周密《志雅堂杂钞》等书写版的余集，曾以与修《四库全书》膺聘入翰林，累迁侍读学士。他兼擅书法绘画，所绘美

人山水都很有名，著有《秋室学古录》。由这些名家书写上版的刻本，字体端丽，镌法工整，是很足以为清槩生色的。

在清代写刻本中，还有一部分是手写个人撰述或所辑作品的。这也是宋人刻书所树立的传统，在清代得到了发扬。乾隆时著名的画家、诗人金农曾自书其《冬心先生集》，汪士慎曾自书其《巢林集》，郑燮曾自书其《板桥全集》，皆为艺林所重。稍后则许梈也以善于写版著称，他除为李文仲《字鉴》、吴玉搢《金石存》以及自编的《六朝文絜》写版外，并曾写刻自己辑录的《古均阁宝剑录》。其书钩摹工细，纸润墨香，一向被认为是当时吴中版刻的杰作。另外如江声以篆体自书所撰的《尚书集注音疏》和《释名疏证》，张敦仁以草体自书所撰《通鉴刊本识误》，则在版刻中别树一帜。这类自己书刻的古籍，都是既有历史文物价值，又富于艺术代表性的善本。

足以反映清代雕印艺术水平的，还有一些特殊版刻。一是版画集。名作如清初肖云从《离骚图》，有顺治二年刊本，所绘人物的衣冠履杖，古朴典重，很有六朝人画意。又所绘《太平山水图画》四十三幅，为顺治五年怀古堂所刊，每幅都具有深远的意趣，鉴藏家以为“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七十四）。此外如康熙时所刻吴逸的《古歙山川图》、焦秉贞的《耕织图》等，均以精细生动见称。还有一些出自徽籍著名刻工之手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神态栩栩，极为工致，在构图和镌刻方面都显示出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风格。

二是套印本。现在传世的套印木版，绝大多数是明代万历启祯年间吴兴闵、凌两家刊行的。不过明人刻印的套版，一般都是两色，三色很少，四色者仅见，五色唯笈谱、画谱或花卉谱有之。清代则不但有精刊的四色印本，如内府所刊《古文渊鉴》之类；而且还出现了绚丽悦目、印工复杂的五色套印书籍。如道光十四年涿县卢坤刻印的《杜工部集》，所辑明清两代五家评语，分别用紫兰朱绿黄

五色,如果加上正文墨印,应当说是六色印本。除此之外,清人刻书还有一些在版框栏线上力求变化美观的,亦为前代所未见。这些特殊版刻,有的虽纯属形式,无关宏旨,但都标志着清代的刻书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从雕印艺术的角度来考察清代刻本,对它们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 读一本民族学文集有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尧汉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也可称为民族学文集,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它的特点是运用野外调查材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文集包括一篇前言和十篇正文。首篇《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在未刊出之前,范文澜同志看了手稿,就十分赞赏,曾以《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为题,在《光明日报》上推荐过,把它誉为“山野妙龄女郎”。关于南诏族属新证一文,是遵照翦伯赞同志的提示,在实地调查中寻获材料写出的,发表后也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注意。

《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一文,运用彝、黎、傣、蒙、维、汉各族材料,阐明我国各族习用虎、兔、马、牛、羊等十二属相的历法,是起源于原始时代的氏族图腾崇拜,并非由外国传入。这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末篇《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别开生面。它根据汉、彝、苗、壮几十个民族崇拜葫芦的现实资料及有关文献,阐明《诗经》说的“籛籛瓜瓞,民之初生”、《楚辞》说的“伏羲”、“女娲”、《后汉书》说的“槃瓠”、“沙壹”,都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崇拜葫芦的演变。文章指出,葫芦是中国各族出自一个共同母体的象征。阐明这一事象,对于我国原始历史和民族关系史,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助于各族相互了解,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进步。

值得提出的是:著者刘尧汉同志是建国三十年来,由党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彝族教授。由本民族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而写出文集,这在中外民族学界是罕见的。我早年从国外学民族学归来,终身从事民族学研究,现年过八旬,能看到青壮年民族学工作者,特别是兄弟民族的民族学工作者,在实践中迅速成长,说明中国民族学后继有人,我内心十分喜悦。我相信,我国各族的民族学工作者,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 杨 堃 ·